

# 美國對華政策——艾奇遜之自白

居 仁 摘 譯

## 第二卷 行動開始

(本卷係艾氏追述其在國務副卿任內之事，起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止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這一段時期，對於我國有無比的重要。大陸之淪陷，即種因於此期間，美國共產黨，同路人以及同情分子滲透美國外交公務，國務院乃至其他部門，阻礙赫爾利、魏德邁諸將軍在華遂行美國協助我國的政策，影響馬歇爾將軍的立場，蒙蔽杜魯門本來模糊的視線。艾氏身任副卿，舉足重輕，可以左右大政，所以自認是其「行動開始」之年。然而他竟袒護這些滲透分子，坐視他們轉變美國既定的政策。事後雖已知錯誤，但仍一再洗刷，表示他與滲透無關。不過歷史自有定論，豈容他輕易逃過責任。且讓我們看如何自圓其說！)

### 一、重拜新命、責任加重

#### (一) 任命之謎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艾氏辭卸助理國務卿以後，立即轉往紐約北部 (Sarag Lake)，探視女兒病況，其友人駐加拿大大使 (Ray Atherton) 亦自奧大瓦趕到相會。原定稍停以後，夫婦二人隨同前往加京度假。女兒 (Mary) 嫁與杜魯門的一個親信 (William F. Bundy)。可是到達以後，女兒告訴他，國務卿已有電話來尋問。艾氏當時認為不會有要事相談，所以遲到晚間回電。孰料貝爾納斯 (Byrnes) 應讀如亡乞儿尸，但一般如此譯稱，茲從家(說，他和總統同意艾氏辭職，是因為工作太忙弄錯了，相反

的，他們要他回院任副卿。艾氏對此不但當時驚奇，據說一直到著書時仍然如此。貝氏又說明，艾氏是唯一在考慮中的人選，他雖然是既驚又謝，但是堅持恢復私人生活的決定。不過貝氏不理這些。他又說，這件事複雜而又嚴肅，沒法由電話商談來決定。他要派軍用專機相接，在華府細談。第二天八月十二是我們女兒和我妻子的雙重生日。日本投降經過瑞士外交部的斡旋，已快到談判的最後階段。由於公私兩方的理由，我得到貝爾納斯先生同意稍緩數日。我妻建議第一天假定已接受貝氏提議，第二天再假定拒絕其事，試看何者感覺較劣。這個試驗並無幫助。兩種假定都使我沮喪。

八月十四禮拜二晚間六時，瑞士代辦通知國務卿，日本投降。第二天我乘軍用飛機返回華府

而余妻則隨駐加大使夫婦去大使館，等候我前往相會。

十五日下午艾氏與貝爾納斯先生漫談。院中高級官員，有願留職，也有決定去職的，兩人同意也商量其他人選，艾氏認為戰時情報機構歸併國務院一事甚為重要。貝氏將一份預算局所擬的改組計畫交艾氏携回夜間研究。兩人分手時，艾氏尚未允諾就任。艾氏閱讀改組計畫以後，認為關於工作協調部分滿紙荒唐關於工作指揮亦嫌薄弱，只是關於合併情報單位，尚屬健全。

夜間我得到了一個決定，其方式之奇怪，像人們所常有的。人們可以始而尚在懷疑與希望往返不決之間，既而明白了。邀我返院的程序儘管是合理的，但是我十分相信這經驗是會使人失望的（按艾氏指想執行任務不成而又回院服務之事）；不過除非我嘗試，我絕不能知道經驗究竟如何，那末我得嘗試一下。失望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但是由於當時所不能預知的原因，這次決定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決定之一。我又一回學懂了幸運在我們的生命中有麼大的力量。

第二天早晨我再和貝爾納斯先生略談，又商酌了院內一兩個人事的安排。於是我就畫了押，做了「詹咪貝爾納斯」號這條幸運船上的大副，再乘軍用飛機去加拿大度假。

召我回院這個決定突如其來，至今我仍覺是神秘的。我不能隨便盤詰國務卿，也許後來他贈送其所著「說老實話」(Speaking Frankly) 在扉頁上所寫的一段話，可以略示一二。他說，書中所述的歷次旅外談判，其所以可能，因為

他深信國務院在副卿管照之下，他可以無後顧之憂。戰時艾氏已有愛國的服務。一九四五年七月艾氏有權重操律務，但是因為他的要求而同意為副卿。艾氏對國家有貢獻，但同時也對他個人大有幫助。艾氏的忠誠友誼，終身不忘云云。

艾氏自己雖覺當時未能自由操執律務。但是無論如何，他生命的途程從此是完全變了。

艾氏決定重為馮婦，使他的另一個女兒（Jane, Mrs. Dudley Brown）也有幾分迷惑，曾寫了一首詩為艾氏解嘲，詩題是「我就是那麼一個不能拒絕人的人。」

（在美國，當公務員乃至當次長部長，薪俸收入可能比不上一個名律師的公費，艾氏以同情美國的立場入國務院當助理國務卿，戰事快結束之際，不見用於新國務卿，急急求退，理所當然。奉召回院，本可不就，但為職權所誘，有意參加「創造戰後新世界」，於是又答應重理舊業。艾氏這段回憶文字雖寫得吞吐玄秘，但旁觀者看來，他有幾分做官「謎」。是不能否認的。）

### (一) 因難之始

在國務院坐第二把交椅當家，却不簡單，在艾氏回華府就任以前，困難便先開始了。

格魯副卿和對外經濟署長（Leo Crowley）向杜魯門做了缺乏遠見的建議。杜氏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下令立即停止租借援助，並通知有關外國政府。這件事所引起的後果，顯非格魯等兩人所能了解。後來杜魯門總統告訴我，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美國政府要在兩年以後才知道

歐洲情況嚴重的程度。不過英國並不要等這麼久。阿特里（Attlee）和邱吉爾當時立刻就意識到英國「極其嚴厲的金融情況」，這是「極其嚴重而令人不安的消息。」（此處給人的印象：艾氏回院好像是英國人夢寐以求的事！）

當時杜魯門先生對記者招待會曾說：「其理由在於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時，規定其為一種作戰武器，我們停戰以後，即不復需要。」此項聲明既不真實，而此一決定則更招致不幸的後果。當時日本尚未簽字投降，美國及盟邦的數百萬軍隊尚待解除敵人的武裝，佔領其土地，歐、亞、中東及非洲尚待安定，其情況猶不可測，此時而有此決定，直使全體盟國之軍事地位，驟失其財政基礎。縱令租借不能化為戰後援助之手段，然在東京舉起白旗以後，不過五日，立即決定停止租借，則既無必要，又屬錯誤。

八月廿七日星期一我宣誓就職，此後歷經兩任國務卿，服務六百七十二日，其中代理院務之時日約在三分之一以上。當時係在國會休息期間任命，故尚待其復會後經過同意手續。

原子能管理的對蘇交涉是另一個難題。九月十八日在閣員午餐時，總統已略談此事有進行國際磋商的必要。廿一日內閣會議時，他提出史汀生上校的備忘錄討論。史氏已決定辭職，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閣議。這件備忘錄當時，以及此後一直是被誤解了，備忘錄所附的函件中曾提及「與俄國分有原子彈」，使若干閣員刺耳，與這誤解誠然有一部分的關係。其實這件備忘錄所提出的只是一個比較狹義的問題，就是關於美國發展原

子彈所引起的問題，(原子武器之競賽，)應該如何與俄國進行討論，其中最重要的處在是說：如果採取的談判方法不當，可能使對俄關係大為惡化而不可收拾。如果美國不即時採取主動與蘇俄接近，而一味的拖延着，而又好像炫耀美國已有此彈的話，將使蘇俄愈加懷疑美國的目的與動機。史氏說明美國在英國支持下，主動向蘇俄提出方案是很重要的。他認為，把許多不重要的小國包括在內構成一個大的國際團體，來和蘇聯商討，不會得到蘇聯重視的。

艾氏以代理國務卿的資格發言，贊成史氏的看法。而且先由少數核心大國洽妥，再向較大的國際團體磋商，是戰後美國向來所採取的，諸如善後救濟總署，國際貨幣協定以及聯合國憲章等等，都是如此議成的。閣員中反對與蘇聯「分有原子彈」，其實史氏原意只在供給情報，使蘇聯分享基本科學資料，而原子武器的工業製造程序則不範圍之內。

此事與美國國內的原子管理問題有連帶關係，又牽涉到國會立法，必須事先疏通。後來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之間英加兩國總理(Arlee與Mackenzie King)到華府會商，因為高度機密，在海軍游艇上進行，艾氏不在場。十五日發表共同聲明，主張由聯合國組織指定委員會提出建議候決，這正是史汀生上校所反對的程序。艾氏當時並不知道，他此後竟須親自負責辦理交涉來證明史氏觀點之正確。

就在這期間，由於參議員中有擁護麥克阿瑟元帥(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瑟」

有譯為「瑞」者)艾氏發言，發生了首次的輕微磨擦。(也許就是後來麥氏與杜魯門政府交惡的肇端)。艾氏受任國務助卿之初，麥氏自東京盟帥統部致電艾氏，熱忱祝賀，並邀請訪問日本，察看實際情況。艾氏覆電致謝，並盼能有此行。但是當時副卿是看家的，向不外出旅行，殆鮮有赴日的機會。

九月十七日麥帥宣告，駐日軍隊六個月內將減為二十萬人。十八日總統答覆記者問，稱麥帥事前並未與彼商洽。但麥帥所需軍隊，可不若其原估之多，渠甚以為喜。三十日原為五十萬人，旋減為四十萬人，茲又減半。

翌日有人詢問，麥帥聲明是否使我不安，又問我有否評論。我說，究需若干軍隊乃純係軍事，國務院並不過問。我接着又說了幾句可以公開引述的話：

「要點在於對日政策乃係本政府迄所堅守之同一政策，而且據余所知，現仍繼續堅守，余自信確知不誤。至於此一政策之遂行，佔領軍隊乃此政策之工具而非其決定者，此政策過去與現在即為實施日本投降；並使日本不能重為侵略戰爭；凡現有社會經濟制度使日本有作戰意志者必須變更，以使其作戰意志不能續存；凡遂行此一政策所需要者均將使用之以期其得獲遂行。」

就在這一天，我的提名到達參議院。於是兩位參議員不滿，便採取延緩同意的手續，一位(Kenneth Wherry, Nebraska)說我「損害」麥帥的「大名」，另一位(A.B.Chandler, Kentucky)說我侮辱了這位元帥。前一位參議

員送給我一長列的問題單，詢問對日政策及主管，包括我對於這兩者的意見在內。我根據有關的官方文件作答，自宮也發表「日本投降後美國最初對日政策」和一件確定麥帥職權的聲明。

這便是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參議院辯論的背景，原來是討論同意我的提名的，可是實際變成了討論麥帥的地位與職權和美國總統的地位與職權之相對關係了。討論時憤怒與苛酷之言兼而有之。塔虎特(Taft)參議員發言，他不贊成(Wherry參議員)將提名案交委員會再審查的提案，因為他認為我是有資格當國務副卿的。他相信美國的政策是美國總統，而不是副卿或次長們，所決定的，他不相信，「所謂麥帥爭議中所表白的不同意艾奇遜的政策，成為拒絕同意其提名的理由」——雖說他在稍前的一項聲明中曾說，艾氏對記者談話所云，是他「前此未聞的一項極其特殊的政策聲明。」另有兩位參議員(Burkley & Connally 皆民主黨議員)則極力為艾氏辯護，再審查的提案只有十二位參議員贊成，而唱名表示同意提名時以六十九票對一票通過，只剩了(Wherry)一位參議員反對。如果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話，我們當時也許可以認識這次小接觸就是那一個爭執的開端，後來終於導致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麥帥的免職。

艾氏代理期間，國務院事務日繁，艾氏為便於統率起見，創設九時三十分會議，每晨召集各單位首長到其辦公室作簡報以三十分鐘為限。其後國務卿返任，不願躬行其事，仍交艾氏主持。艾氏認為自行行政方法而言，此會有無上的重要，

但須有極其嚴格的紀律。這個會可以使他洞悉其同事的個性云。不過艾氏亦說明會議不可太多；院中領導及主管薄弱才會有會議繁多的後果。如果國務院是經過會議，委員會或是蘇維埃(Soviet)在俄文原意本為會議)來辦事，那就根本不是辦事了。(按從此等處在，亦可見艾氏的個性！)

是年十一月中，艾氏代表國務卿去紐約出席一次蘇美友好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oviet—American Friendship)主辦的集會。初嘗「友好」風味，觸了一次小小的霧頭，才知道這種集會的騙局。艾氏原來只以為發表一篇演說，附和總統及海陸軍當局，誇獎這個盟邦而已。等到抵達會場，便覺空氣不對，先前的情報大有問題。

會場是在紐約麥迪遜方場戶內運動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全場滿座，人聲嘈雜。場中心擂台高聳，一條道道通達一處圍幕掩幃着的地方，就在那幕後我會見是日其他演說的角色：友好會會長(Corliss Lamont 摩根公司董事長之子)，前駐蘇大使，「奉使莫斯科」(Mission to Moscow)著者，戴維斯(Joseph E. Davies)，後來成為蘇聯公民的黑人男低音名歌星羅比生(Paul Robeson)，還有英國坎特布里「紅色」大主教約翰生(the Very Reverend Hewlett Johnson, the "Red" Dean of Canterbury Cathedral，以傾共著名)。擂台下方一個樂隊正演奏着烈火性的音樂。樂止以後，一通鼓響，嘈雜聲稍靜，戴維斯大

使登台。強力擴音器吼出了他的聲音，他逐一唱名，介紹演講人登台。於是每人在一通一通的鼓響聲中出場，好像從前法國貴族在(巴黎)革命廣場登上斷頭台，或是英王查禮一世從宮中上刑場一樣。羅比生和約翰王大主教顯然是(群眾)最歡迎的人物。真的，當這位「紅」大主教，身穿黑色長袍，帶着英國教長們慣用的裹腿，像溜冰一般地沿着擂台四週滑走，雙手抱拳高舉在頭上像賽拳人一樣，向大家致禮時，群眾歡呼，如癡為狂。友好會會長致簡短的歡迎詞以後，羅比生洪亮的嗓音哼出了一首動人的被壓迫而無望的歌詞(Ole Man River)。可是其結果並不像河水一般無望而淒測的向前流，竟變成了愈過愈強的抗訴，結束於強力的反抗高音之中，嗓音本已宏大，又得到科學的全力之助加以擴大。群眾是瘋狂了。

良久稍靜，又被大主教的煽動講詞再度狂熱起來，他的牛津腔調，並不影響其煽動力量。演說變成問答對唱，大主教喊出有修辭的問題，而群眾則響出應答。接着大歡呼，好像是為了演說者，又為了他們自己，或者是因為他是他們的自己人，後面便是輪着我說話的時候了。我感覺我好像是酒吧師傅，宣告打烊以前，最後的一杯只有牛奶紅茶了。所幸所我的詞兒很短，不過在結束以前，我加上了一段我自己的話——那一晚我臨時插入講稿的處在很少。那是加在承認蘇聯有理由盼望其沿邊各國政府對蘇友好之後。其詞如下：「但是對我們而言，那也是同樣明顯的，就是注意安全的興趣必須顧念到，而且尊重各國及

人類的其他基本利益與興趣，例如其他人民選擇其自己生存的一般環境，以及一切人類人身安全的權利與興趣。我們這些利益與興趣的調整應有其界限，勸說與堅持不可化為脅迫，夜半敲門不能使男人或女人發生恐怖之感。」

噓聲與貓叫(Catcalls)大作，我趕緊這兒引一句莫洛托夫，那兒引一句史大林，來喂這些豺狼，以期平息反對。但是我已經表明了我的色彩；那些只要紅，而不肯有一絲藍與白的人是不願稍受撫慰的。當我講話完了時，抗議的呼聲把禮貌上的鼓掌完全淹沒了。在這場狂暴結束之時，一位警員推着我的手臂說：「來，我引你一條僻靜路兒上車。」真是，再沒有其他任何事兒比這還更受歡迎的了，也許我寄居的朋友家中等着我的一杯蘇格蘭酒(威士忌)算是例外。(艾氏這一段描寫，的確十分細膩，可以賽過名家的小說。但是他身為國務副卿，竟然不知羅宋人的把戲，受人愚弄與嘲笑，不免令人噴飯。我們中國人，凡與毛子略有交涉者，則沒有不知曉這一套黔驢之技的！)

可是幾年以後，有人竟指我那次出席麥迪生廣場的集會，可以證明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做人真難。林肯說過，沒有人能在一切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我似乎要加一句說，無法在任何時候討好任何人了。

### (三) 赫爾利大使辭職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國務院的中國(事務)科(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發表

一件聲明，可算是一個重要的「有名的臨別致辭」。聲明中說，我國駐華武裝部隊是協助中國政府執行日本在華軍隊——約二百萬人——之投降，解除軍備與遣送回國，末了說：「我國駐遠東武裝部隊之活動，包括運送中國軍在隊內，僅係在於遂行上述目的。我國之目的不在於涉入中國內政，亦無意於此。」可是不到一個月，我們便整個兒的牽涉進去了。

（當時美國對華政策之執行與轉變，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憤而辭職有關。艾氏本來就鄙視赫爾利，而且還有宿怨，到此更是火上加油。艾氏並不掩飾，赫氏之離職與彼有關，這也就證明了他是袒護或是支持共產黨的滲透分子的。且看他如何道來！）

赫爾利 (Patrick J. Hurley) 本是俄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的牧牛仔，走了運，當過胡佛總統的陸軍部長，作戰時以少將官階為日本人打傷掛彩，現在是美國駐華大使，回國諮商。麻煩跟着他走，像蒼蠅如雲追着小犢子一樣。身材英美，空虛浮躁，常常誇口他當年西部抽鎗對打時決死的速度，這充分證明他對於他現有使命上的複雜問題，也尋求同等簡單的答案。他告狀的嗓子很大，而內容摸不清楚。他起先控告美國駐華外交官員抽他的後腿，破壞美國對華政策，末後又圖圖吞棗的攻擊國務院，可能就是國務卿，未能將其政策明示公眾，他的指責之中充滿了即將來臨時代（按艾氏指後來麥加錫 (McCarthy) 參議員指控共黨分子之時期）的煽動性強詞奪理 (demagogic) 調調兒，凡是意見

與彼不同的都是「對共產主義軟弱」。

我和赫爾利在一九四四年早就有過麻煩，其時他因戰傷退出積極軍事服役，而附隸於中東供應中心 (Middle East Supply Center)。那時，像這一次一樣，他回到華府，發言指責租借物品之濫用，主要上攻擊此種物資是經由英國人之手在伊朗分發的。這本來是對的，因為英軍駐紮伊朗南部，而美國人由於戰爭的情勢不能到達伊朗。後來北非勝利以後，此一情況既除，美國人便在伊朗自行處理租借了。赫爾利的另一指責是俄、英帝國主義，催促美國與此主義分手，並另以揭示民主代之。赫爾利的備忘錄經送交赫爾先生評論，又經批交我們諸人作覆。我當時對於赫爾利提議將民主施之於佔領中的伊朗，也許是太鹵莽了一點，借用我一個助手的字眼，稱之為「救世主的大塊文章」(“messianic globaloney”)，不妨留待我們和我們被批評的盟邦（按艾氏指英國，他好像是處處迴護此國！）協力對抗希特勒與慕索里尼的戰爭結束以後再說。這幾個字洩漏給赫爾利了。以下的故事，我引述我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陳述：

「……赫爾利將軍自中東歸國，數週以後，來到我的辦公室，要求開會討論此一問題。我們會召集國務院官員數人開會，其中包括我的一個年輕的助理。起初會議在友善的空氣中進行，接着赫爾利將軍便有幾分火熱起來，提起我致國務卿的備忘錄中所用的幾個字。他認為這是出自當時在場的那位年輕的助理。我對這位將軍指出，我如何處理辦公室以內的事務，絲毫不干辦公室

以外的事，是凡有我簽字的備忘錄，我完全負責，而這一件備忘錄我更負責。將軍置此不顧，認為是我愛護同仁的一種唐吉訶姿態 (quixote)，並且繼續攻擊這位助理。

「爭論熱烈，溫度上升，口角者的聲調也隨之提高，以致最後將軍詢問我的助理，為何不穿上軍裝，和國家部隊一齊作戰。

「這就我看來，似乎是一句特別不相宜而且不幸的話，因為這位青年人不僅會努力設法參加軍隊，而且確實在過軍隊，只是因為背部患有嚴重疾病，準備接受一次外科大手術，而被解除兵役。他後來不久便經過一次手術，臥牀將近一年。

「到此我便參加辯論，提請將軍注意，他這句話是不甚相宜。一般的空氣似乎是冷靜了一點。我們設法請各人安坐，各自收回試以爭鬧解決的要求，最後我們達成協議，將軍收回這一句不幸的話，而我則向將軍道歉，如果我的備忘錄中有任何可能冒犯將軍的字樣。

「事態似乎已獲解決，我們並且繼續開會，和睦討論，從那天起，我從未聽人提起此事，一直到了五月二十日皮爾生 (Pearson) 君纔有專欄報導，不過此後又不再聞人道及，以至這位將軍於其證詞中又提出為止。

「我們會過幾次面。關於租借供應問題，我們有過幾次討論，我並不覺到，我見疑為破壞了任何政策……

「照將軍的表示，我是偏袒獨佔和帝國主義而反對民主，這是極端幻想之說。我沒有一件行

動。沒有一句話，可資為這種說法的任何根據。——(艾氏此節係引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國務院公報。)

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指責國務院的其他官員在地球的那一面破壞其他的政策。貝爾納斯國務卿竭力婉轉撫慰，自以為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上午已經勸妥赫爾利返華復任。可是中午在白宮，他發現了他自己弄錯了的程度。總統與內閣在白宮據報，赫爾利對全國記者協會發言，不僅對國務院，而且也對政府全體猛烈攻擊，指責缺乏明白的對華政策。他說，他的辭呈已遞放在貝爾納斯先生的桌上。是日下午總統與馬歇爾將軍通話，他正擬從積極服務退休，作一長期休息，總統請他赴華以大使銜名擔任其個人代表。馬歇爾將軍答稱，只要是總統的願望，他可以任何資格去任何地方服務；這是他向來如此的典型答覆。白宮同日宣佈(赫爾利)辭職與(馬歇爾的)任命。

(以上艾氏所說，赫爾利是牛仔，浮躁，誇口善於決鬥乃至與國務院一個青年官員口角等等，似乎文不對題。國務院裡究竟有否官員破壞對華政策乃是問題所在。艾氏避重就輕的筆法，在最近柯貝克(Prof. Kibek)再度揭發「美亞文件」以後，便站不住了。不過下面還有一段巧妙的轉筆文章，亦可見著者外強中虛。)

雖說赫爾利的個性不足引起同情，可是他的失望後來倒是變成了我們全體的失望。政府是有一個政策的，並且會明加以確定。那就是我們以全力恢復一個「強健，統一而民主的中國」，不藉介入中國內戰，而只是假手妥協互相戰鬥的黨派

，以求達成。於此期間我國繼續承認國民政府，並在「國際事件上，尤其在消滅日本在華勢力上，與其合作」。赫爾利將軍早經宣告，這就是他本人的二重目標。這也是政府、國會與全國所一致公認的。然而我們當中，包括赫爾利，我自己，國務卿，馬歇爾將軍與總統在內，鮮能理會到，這二重可羨慕的目標是互相排斥而又不能各別達成的。後來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總理會到這一點的，我們留在後文再說。(這豈不是自承美國當局要人全體幼稚嗎？我們中國人幾乎是不能相信！)

#### (四)杜魯門與貝爾納斯不睦

在馬歇爾將軍出發赴華以前，貝爾納斯國務卿便飛往莫斯科，與莫洛托夫及貝文(Bevin)會商五項要事：與德國以外，其他歐洲敵國議訂和約之程序；巴爾幹問題；中國綏靖；日本佔領，以及國際原子能管制。關於第一，第四及最末一項，會議妥程序，後來在第一及第四問題上成功，而末項則否。關於第二及第三兩項也達成協議，可是後來毫無成就，慘痛失望。不過，這些教訓了我們，蘇聯的外交方法是努力討價還價，接受對方的一切讓步，而把他們自己的讓步全部勾銷。(這教訓早就該有了，何必等到此時！)

然而，一九四五年莫斯科會議的主要結果是總統與國務卿之間發生了裂痕。貝爾納斯不喜多帶隨從，同行赴俄者只有五六人，一切寄托駐莫斯科大使館同仁協助，發回來的報極為簡短。關於原子能交涉的訓令比較寬泛。陸海軍首腦

(General Groves and Secretary Forrestal)表示不安。參院外交委員會及原子能特別委員會亦有同感。貝氏十二月十二日赴俄後兩日，特別委員會與總統會商，我奉召在場。委員會要求另發比較嚴格的新訓令。總統並未照辦，只囑我將會商經過通知國務卿，渠復稱將遵守十一月十五日兩國協議的宣言。總統又囑我向貝爾納斯保證，他不為國會的驚張所動，並樂於考慮俄方的任何提議。此後從莫斯科發來的消息甚少。

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正在他的家鄉(Independence)。莫斯科密碼電報到達華府報告部長會議之結束及其結果。電報尚未譯完，記者的摘要報導已見於報紙和電台廣播。范登堡誤會了其中的一段，立刻反對。總統鑒於俄人在巴爾幹的問題未有結果，也覺到煩惱。等到我和總統把范登堡安撫平靜了以後，不幸我自己又使總統受了一重刺激。原來貝爾納斯先生電告我返抵華府日期，要我安排當晚透過全體廣播網向全國報告。這是不合於禮節的，而且鑒於當時總統的情緒，亦屬不智。從這兩方面看來，都該先向總統報告，把事情弄好，然後經過總統的同意再發表演說。我明知貝爾納斯先生會不贊成我如此做，我向總統建議，如果貝爾納斯先生在回國後第二天發表演說，各個有關方面，包括廣播電台網在內，都較相宜。總統同意，我即如此安排。

從飛機場回院，在車中我婉轉的告訴國務卿，總統不快。他有點疑惑，不耐，而且對於總統乘游艇(Williamsburg)循河(Potomac)而下，留言貝爾納斯前往晤面，也有點激動。

他經過長途飛行，那天已倦於旅行。事後關於那天的晤會的情況，兩人皆曾對我說明。總統的一番話，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加以記載。他加重的說，他其所以讓國務卿放手去做，乃因國務卿同時會給他充分的情報。貝爾納斯先生的說法亦無不同。他認為那次討論對他有益而總統亦是愉快。他們分手時，彼此友愛的互祝新年如意。這樣一來，貝爾納斯先生以為我是幻想本不存在的麻煩了。

其實兩人的印象都可能是真的。關於杜魯門先生發怒的報導多半是大為過甚其詞的。如果他大受激惱覺到別人對於杜夫人或其女公子不恭，他是會失去控制而破口大罵的。不過他畢竟是一位和善之人。不管他的政治批評是如何的辛辣，他在和人談話時是極其體諒他人情感的。我從沒有親自聽到，或聽他人說到，他對任何人當面說過一句苛刻，酸苦或諷刺的話，不管對方有何冒犯或過失。至於貝爾納斯先生則並不敏感，或缺乏自信。他熱烈外向，習慣於南加羅林納州(South Carolina)的政治作風，意見相左的對頭不妨暢言對質，所以不會把杜魯門先生取得充分情報的願望，感覺到是他個人的批評。

而且，貝爾納斯先生對杜魯門先生懷有一種參院領袖對初進參議員的態度——至少總統有此想法。又加上一九四四年副總統提名的痛苦經驗。我提起這一點，是因為這與後來的事端有關的。一九四四年夏初，多數民主黨首領，包括貝爾納斯和杜魯門兩位先生在內，但韓乃根(Robert Hannegan)除外，都相信羅斯福在下任總統選

舉運動中要的是貝爾納斯，不是華萊士，當副總統候選人。因此，參議員杜魯門，在貝爾納斯要求之下，便同意在芝加哥黨代表大會中，為他提名。可是屆時韓乃根熱烈辯說，杜魯門參議員的消息錯誤，羅氏所要的，既非華萊士，亦非貝爾納斯，而是杜魯門。羅氏其時正擬登艦(Battle more)前往珍珠港與尼米茲海軍上將及麥克阿瑟元帥會面，韓乃根接通電話向總統解釋杜魯門的想法與做法以後，把受話器轉大，讓大家聽到羅氏證實韓乃根之說。杜魯門大窘，雖經羅氏要求，仍覺難於接受，蓋此將失信於友。最後為羅氏說服，往告貝爾納斯，並請見諒。貝爾納斯雖大為失望，並憤韓乃根之中梗，但仍與杜魯門維持友好。此事會由杜魯門先生著之於書，並先期告我知悉。他並說貝爾納斯且驚佩他曾堅決抵抗反貝爾納斯集團的詭計，所以後來在羅斯福葬禮歸途，邀請貝爾納斯出任首席閣員，不僅是藉重其大才，亦是部分補償其心中之抱鬱，以為故總統曾予以極不公之待遇。

這整個不幸的故事會使我關於總統及國務卿相互關係有極深刻的印象。前文已經說過，總統不能自為國務卿，

而國務卿亦不能自為其總統。不管國務卿在執行任務時會獲得如何巨大的自由，總不能兼有總統的最後責任，總必須事前使總統獲得充分報告，容其有選擇決定之可能。自此以後，貝爾納斯外出即攜帶通信官員，與國務院及白宮聯絡。艾氏以為他由此獲得經驗，後來自任國務卿時，每外出必有官員逐日向院中報告，並另有簡報備總統之用。不時他還親自擬報告，「只備總統過目」，以便對於環境與人物有深動的了解。艾氏又以為貝爾納斯外出旅行，有時還向院中指示，是不甚妥當的，因為離院以後，即不免隔閡，應由代院首長根據院中所獲全部情報資料，加以判斷，相機行事，方為相宜，後來馬歇爾將軍長院便嚴格如此辦理云。

## 聯和印刷廠

精 印  
彩色封面、圖書文件  
報表冊籍、平版印刷  
文件迅速、歡迎惠顧

臺北市迪化街一段二五八號  
電話：五五二八〇五號